

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基督教视角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f Faulkner's Novels

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

Yang Caixi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英文提要]

In his creation, William Faulkner borrows and transforms tremendous Biblical thinking tradition and literary manner of writing. He depicts his imaginative world from the Biblical story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ake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iblical allusions and characters so as to present his literary imaginatio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the whole tendency of his literary imagination, his employment of the Biblical tradition is predominantly display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occurrence of the Biblical themes, the quotation and inversion of the Biblical structure, the borrowing of the Biblical images and symbols, the creation of the Christlike hero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the technique of irony.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福克纳力图透过南方社会这面镜子透视和揭示人类生活的奥秘与命运。他的作品尽管集中描写美国内战及战后重建时期约克纳帕塔法这一南方小郡

的社会现实，但其思想力度却远远超越这一时空维度。在创作中，他大量借鉴和化用《圣经》思想传统和文学性表现手法，作品里不时浮现的古老的《圣经》母题，如人类的犯罪、堕落和救赎等主题，是他在小说里揭示人类善恶对立和矛盾冲突的主要内容。作家以失败、衰落、背叛与死亡这些负面意象来深刻揭示悲剧性的人生主题，并通过从外界而来的超越式的救赎来展现人类存在的希望。在福克纳作品中，这其实是宗教信仰带来的对人性美和善的肯定。

从宗教视角来看，基督教清教主义思想在福克纳的创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堕落（原罪）——报应（惩罚）——忏悔（救赎）这些方面，这与整部《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整个叙述有着一定的同构关系。《旧约》以《创世记》开始，记述了上帝创世、人类堕落、伊甸园丧失的故事。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永远为人类带上了原罪的枷锁，人类丧失了创世之初的那种完美性，取而代之的是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自由意志为人类的堕落提供了最大的前提，而上帝对人类的罪行则不断以洪水、大火、死亡等方式加以惩戒。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新约》的四福音书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和新的救世主，同时带来了获救的新希望，使人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从福克纳的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来看，作品的整体模式体现了基督教这一思想框架。福克纳对《圣经》文本的不同程度的援引、借鉴和化用，是他创作中显而易见的文学现象。他把基督教思想和《圣经》文学框架艺术地置放在他的文学想像世界之中。H. H. 瓦戈纳认为：“福克纳小说的意义大体上基本与古典基督教关于人和世界的总体看法是一致的。”他还解释说：“从《熊》开始，福克纳作品的特征是其不断试图为现代读者重述福克纳所认为的基督教神话的根本意义……构成福克

纳三四十年代作品的基本设想是：基督教信念的教义既是比喻性的，同时又是极其真实的。”^① 据统计，在他的 19 部小说中，共有 344 处对《圣经》的直接援引或间接参照，其中《喧哗与骚动》最多，高达 55 处，《掠夺者》最少，只有 1 处。^②

《喧哗与骚动》借用耶稣受难周的宗教背景展开叙述，以受难日、圣礼拜六和复活节为叙述的时间点，借耶稣受难这一宗教事件影射社会现实。凯蒂的失身象征着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和南方社会的堕落，而三兄弟对她的不同反应和态度则暗含着从不同角度采取的徒劳无益的救赎行为。白痴本吉充当着凯蒂道德监护人和提醒者的角色，他的身上隐现着耶稣基督的影子，带有许多神秘的神性特征。作家也似乎在有意提醒读者他就是一位基督式的人物，圣礼拜六恰好是他 33 岁生日，而且他是在 33 岁那年被阉割的。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还特意用了很多笔墨描绘本吉和迪尔西在黑人教堂倾听黑人牧师讲“羔羊被宰，耶稣受难”的《圣经》故事。

《押沙龙，押沙龙！》更是体现了《旧约》里原罪—报应的原型模式，并重述了《历代志》里大卫和押沙龙父子的传说。据《圣经》记载，父辈的罪孽要子孙后代偿还，上帝定会追讨他们的孽债。塞德潘早年抛妻弃子，后来让黑奴为他建立“百哩庄”，而且拒不承认亲生儿子波恩，这些丧失人性的行为注定了他要遭受惩罚的必然命运。他的罪行还殃及到了女儿们，波恩死在同父异母的兄弟手下，女儿裘迪丝因此“未出嫁就做了寡妇”，亨利则远逃他乡。塞德潘一天之内失去两个儿子，面临着家产无子继

① H. H. Waggoner: *William Faulkner: From Jefferson to the World*, pp.246-247.

② 参见 See Jessie McGuire Coffee: *Faulkner's UN-Christlike Christians: Biblical Allusions in the Novels*, pp.129-130.

承的威胁。在这部小说里，“使他（指福克纳，笔者注）着迷的美国南方，既是已受天谴的罪恶渊藪，又是充满希望的迦南乐土”^①。作家对南方传统的眷恋与痛楚，在他对基督教原型模式的运用上可见一斑。在罗沙小姐和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中，还不断夹杂着与《圣经》或希腊神话相关的内容或观念，比如说前者不时地提到《圣经》，她从来不提塞德潘的名字，而是把他称为“魔鬼”，并把他与《旧约》里罪与罚的观念联系起来；后者也不断地把塞德潘与希腊神话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他特定的悲剧角色的意义。

《八月之光》里也透射出福克纳对《圣经》母题的运用。小说中塑造的克里斯默斯借用了基督原型，作家把主人公被处死与耶稣被钉十字架作一类比，是要通过把他比附为耶稣，来告诉读者偏见、无知和固执等人性弱点会导致怎样的人间悲剧。作家并不要求读者去同情和怜悯克里斯默斯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结局，而是希望人们对人类的这种悲剧性处境能够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八月之光》是福克纳对他认为的自己家乡宗教过失和种族罪恶的证据最为充足的声明”^②。克里斯默斯的悲剧是一出社会悲剧，是环境强加于他身上的罪恶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克里斯默斯也是一位无辜的“替罪羊”。

《我弥留之际》为读者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本德伦家人答应即将离开人世的主妇艾迪把她的尸体抬到杰弗逊她家族的墓地去安葬。这一画面使人想起了暂住埃及的雅各临终之前对约瑟的嘱咐：“……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

① 朱炎：《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意象》，见《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70页。

② Ed. J. Robert Barth, S. J.: *Religious Perspective in Faulkner's Fiction,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 p.122.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创 47：29 - 30）小说就以艾迪的去世和全家人抬着她的棺木前往墓地的旅途为线索展开叙述。就这样，全家人各怀心思踏上了旅途，迪薇·德尔想去打胎，卡什想买台留声机，安斯想换一口新牙——顺便再换一位新妻子。路途中也是百态万象，他们还遭遇了大水 and 火灾等天灾人祸。这情景恰似一出现代的《出埃及记》，本身带有几分悲壮色彩的送葬队伍被赋予了强烈的讽喻意义。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旧约》色彩似乎显得比作家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浓郁，菲利普·鲁尔认为，“批评家们在寻找《我弥留之际》蕴涵的宗教价值观时，提到了希腊和罗马的影响、加尔文主义以及基督教的总体启示。然而，没有哪个因素像《旧约》精神那样如此弥漫在小说的格调里和外观上。主题、态度以及频繁使用的措辞和韵文旋律都来自对‘前基督教’体验的书面表述。具体来讲，小说整体上带有《约伯记》的强烈暗示。救赎、宗教性、部落的团结一致以及几乎是一种宗教行为的性爱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内容以及《旧约》的其他主题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①。从故事情节的铺垫到语言风格的运用，都显露出《旧约》对这部书的影响。关于小说的构想，作家这样说：“我只是设想有那么一些人物，遭受了最平常、最普通的自然灾害，就是洪水和大火，我让这些人物的发展完全由着一个出自本性的单纯的动机去支配。”^②事实上，福克纳正是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内容来展现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婚姻、家庭、性爱、孤独、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等。

福克纳的作品还经常表现“受难的仆人”的主题。根据基督

^① Ed. J. Robert Barth, S. J.: *Religious Perspective in Faulkner's Fiction,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 p.107.

^②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260~261页。

教神学思想，那些为了其他人而经受磨难甚至牺牲的人物均属于这类形象。“‘受难的仆人’故事里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类受罪是有意义的’这一观念。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上帝利用邪恶和让人们受罪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益处。”^① 在这一意义上，仆人受难是美丽的，因为它成就了对信仰者的拯救和最终意义上的救赎。《创世记》里约瑟被兄弟们卖到埃及以及在埃及的作为是这一形象的最好注脚，而耶稣受难则是这一主题的极致发挥。

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屈尊降到罪恶的世上，为人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并作为救世主的形象为人类带来了福音和真正意义上的救赎。“耶稣不作为政治上的国王统治世界，而是受难的仆人；不使用武力战胜敌人，而是作为罪人被处死。”^② 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基督被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倒置的传统英雄概念。这一形象蕴涵有人性和神性的许多重要内容，成为众多小说中“受难的仆人”的原型。福克纳借用这一原型塑造了许多基督式人物，并依据小说力图表现的思想对其进行了逆转和倒置，以期达到抨击人性丑恶和传统价值观约束人性的弊端的目的。作家利用主人公与基督形象的类比，如年龄的暗示（33岁）、人物名字的缩写（J.C.）以及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宗教仪式，暗示这类基督形象的存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上帝赋予人的很多美好品性，具有吃苦、忍耐、牺牲这些善和美的品格。

哀伤的主题是《旧约》的重要内容，在《约伯记》、众先知书、《哀歌》里都有大量哀叹人生和命运的篇章字句，《耶利米哀歌》利用大段篇幅哀叹耶路撒冷的陷落、圣殿的毁灭以及以色列的命运，表现了上帝的惩罚以及上帝选民的忧愁和希望。也许，只有人的痛苦和悲伤真正触及灵魂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时候，才会

① Leland Ryke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 p. 57.

② Ibid., p. 275.

发出这样的哀叹，而这种伤心和凄凉被福克纳恰当地用来表达对南方社会的那种复杂情感。《押沙龙，押沙龙！》的书名就给人一种痛哭哀伤之感，读者好像听到了大卫那遥远的呼喊：“我儿押沙龙，我儿押沙龙啊！”其实，类似的哀叹在作家的其他小说里也不时响起，是作家对南方社会腐败堕落的憎恨与哀伤，同时也是以艺术的形式对人类德性的堕落和命运悲剧的咏叹。

整部《圣经》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根本对立，实质上就是善与恶的对立和冲突。撒旦的存在对于基督而言是一个潜在的、富有诱惑性的挑战，因为他使得人们拥有选择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圣经》表现了以上帝（基督）为代表的善与以撒旦为代表的恶之间斗争和抗衡的张力。在文学创作里，矛盾的这种对峙与冲突也是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焦点和中心。由此看来，《圣经》观念或者类型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西方文学创作的重大母题，因为归根结底，宗教和艺术都是对人类终极价值和命运的关怀与评判。福克纳文学创作根本上都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他早期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发现邪恶，这是人类开始进入现实本质的一部分”^①。《圣殿》通过主人公霍勒斯·本博在现实体验中感受到邪恶普遍存在这一事实，生动地描绘了是非善恶这些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和斗争；《喧哗与骚动》里的杰生、《押沙龙，押沙龙！》里的塞德潘、《熊》里艾克的祖父都具有矛盾和冲突的性格特征。福克纳认为，邪恶违背了人性，是对道德的最大背叛，而善就是对人性美好内容的保留和张扬。作家的善恶标准出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基督教“是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准则，全靠这一套准则，人的为人行事才得以

^① Eds. G. B. Tennyson and Edward E. Ericson, Jr. *Religion and Modern Literature, Essays in Theory and Criticism*, p.312.

比较高尚些……”^① 他就是依据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南方清教主义思想，为他塑造的人物赋予特定的个性，作出各式道德评判。

以上主要从宗教视角分析了福克纳创作的主题。事实上，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很难用某个主题框架把他的思想限定在内的。1965年，福克纳曾说：“我没有主题，或者，可能有——你们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信心，相信人类有经受和战胜客观环境和自身命运的能力。”^② 作家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这种看法与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演说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是因为在生物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断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③ 福克纳对人类抱有的这种希望根植于他对人性中美好内容的眷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作家的小说里解读出许多不同的内容，其作品的伟大之处大概也正在于此。对福克纳的这些不同解读表明他的小说本身蕴涵着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不管作家采用何种表述方式，其实都是殊途同归，述说的都是对人类的情感、抗争与命运的关怀。

二

加拿大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一书为研究《圣经》与文学的关系洞开了一片新颖的天地，它在文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沟通了宗教与文学这两个重

①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264页。

② [美] F.J.G. 霍夫曼：《福克纳》，濮阳翔译，37页，纽黑文，1961；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147~148页。

③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255页。

要的精神领域。宗教和文学作为旨在表现人的内心精神活动的特殊领域，其内部隐含着多种代码，具有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的多种潜在可能性。具有丰富文学性的圣经叙事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圣经》中的母题、象征、类比演化成跨文化的普遍性符号，其中的主题思想、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成为众多文学想像的原型模式。

弗莱在该书的第二编“类型的序列”里以“神话”为题展开了对圣经叙事的讨论。他认为，整部《圣经》大体上呈现一个“U形的叙事结构：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这个接近于U形的模式，在文学作品中以标准的喜剧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是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U形故事结构之中：在《创世记》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在首尾之间是以色列的故事”^①。《圣经》的这一叙述方式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叙事文学的原型结构，其中许多叙述起伏跌宕，低谷与高潮交替出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旧约》的整体框架表现出明显的“U形”结构，伊甸园的美好境界因人类的堕落而下降，上帝洪水的惩戒和方舟的救赎，出埃及的拯救，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分裂，耶路撒冷的沦陷，巴比伦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命运的起伏升降一次次印证了犯罪——悔过——救赎的主题。《新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一模式，到了《新约》的结尾，《启示录》里写到末日审判、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以及基督再临，象征了人类重新获得因堕落而失去的世界。从《旧约》到《新约》的整部

① [加]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2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圣经》可以说就是人类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历程。

这种叙事方式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喜剧尤其是顺应了这一思维模式：情节展开，进入低潮，然后戏剧性地转折，最后达到高潮。喜剧中也蕴藏着许多悲剧性因素，构成了喜剧成为喜剧的关键性内容。福克纳的创作大多以此为切入点，小说人物充满了悲剧意识和命运，而对这一内容的表述方式正是小说叙事的关键所在。作家以圣经叙事为基本框架，并根据创作意图，对这种框架进行调整或置换，以适应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

福克纳对圣经叙事结构的运用非常频繁，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相关内容。总体而言，他对《新约》借用相对较多，而且主要以耶稣故事做文章，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耶稣受洗之前的经历（《熊》里的艾克·麦卡斯林）、耶稣受难和复活（《喧哗与骚动》）、基督式人物（《八月之光》、《寓言》）、救赎叙事（《修女安魂曲》，其小说叙事与基督徒犯罪——赎罪——得救的精神历程相呼应，表现出用宽恕和赎罪祛恶救世的思想）。对《旧约》的运用则多借用其庞大的叙事框架，如《我弥留之际》里的《出埃及记》旅途框架、《押沙龙，押沙龙！》表现的大卫王家族悲剧。福克纳对于这些框架的借用多强调其悲剧性的低谷阶段，他的救赎上升阶段显得比较短暂和淡薄，有时干脆就把救赎一笔抹去（如《押沙龙，押沙龙！》），突出描写罪恶、报应和惩罚的内容。即使是他塑造的正面人物，也往往反其意而用之，将其倒置或逆转，以期产生强烈的悲剧艺术效果。这一“倒置的U是悲剧的典型形态，与其相反的则是喜剧的典型形态：它上升达到命运或环境的‘突变’或者行动的颠倒，然后向下直落堕入‘结局’，而‘结局’这个词含有‘向下折转’的修辞意义。不过《圣经》

并不把这个运转变化看成是悲剧，而把它只作为反讽”^①。弗莱的这一结论特别契合福克纳的文学创作，最为典型的是他塑造的塞德潘形象。塞德潘身上的“伟大”因素，这个“神”或者“魔鬼”那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永不气馁的精神是他能够实现他的庞大设计和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塞德潘“百哩庄”的建立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杰作。他似乎成功了。然而到了这儿，故事情节逆转直下，波恩的出现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塞德潘家族开始从高处向下滑落。波恩和塞德潘被杀，“百哩庄”被大火烧掉，一切在瞬间化为乌有，小说的叙述到了“U”形的最低谷。

诚然，福克纳叙事的宗教视角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娓娓叙述之中。笔者认为，福克纳是在借用古老的《圣经》记载重述现代故事。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印证这样一个事实：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兴盛，是古今中外的人们体验的一条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关注神话叙事结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

意象和象征是文学想像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利兰·里肯等学者编著的《圣经意象辞典》是一部《圣经》文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辞书，对《圣经》中出现的意象、象征、类比、比喻以及其他文学修辞手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认为，“意象”就是：“任何可以确定一个具体事物（比如树或房屋）或动作（比如奔跑或脱粒）的词语。我们可以想像的任何物体或动作都是意象。”而“象征”是“除了其字面意义之外还代表某种含义的意象。”根据

^① [加]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228页。

这一区分，理解《圣经》的“意象”有两个要求，一是“从字面体会意象并尽可能完全从感官上体验”；二是“对于意象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要特别敏感”。而且，“言外之意的最基本形式仅仅是当意象在上下文中出现时，其联想意义究竟是肯定的抑或是否定的方面”。象征“意义更为丰富，而不仅仅是直接意象的内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一种文化里，象征手法作为共同的语言而出现”。“意象”多具有物质层面的形象和特征，字面意义对它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象征”则是在“意象”之上发展出来的第二层意义，超出了后者单纯感觉层面上的维度。^①“意象”和“象征”是《圣经》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文学修辞手段，尤其在《新约》耶稣传道时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看似浅显简单的话语却能够形象生动地传达出寓含的深意，达到强烈的艺术审美效果。

《圣经》意象和象征是福克纳创作中常见的内容，在作家文学想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福克纳文学想像中常见的几个意象是水、火、树等自然现象，在看似轻描淡写的描述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象征意义。

《圣经》自始至终赋予“水”以独特的地位。《创世记》一开始就写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 1：2），“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创 1：20）。水不但有滋养生命的作用，还蕴涵极大的杀伤力。洪水故事成了众多文学作品的原型，表明了水所具有的破坏性，也象征着它涤净邪恶、洁净世界的功用。《福音书》对“水”的洁净功能进行了充分的强调：“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太 3：10-11）这里显然把《圣经》里经

^① 参见 Eds. Leland Ryken, James C. Wilhoit, Tremper Longman III: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 p. xiv.

常出现的水、火和树三种意象联系在一起。耶稣也是在约旦河里受约翰施洗。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7：37-38）《启示录》里也写道：“……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22：17）

《旧约》强调“水”的物质层面的含义，含有“清洁”、“滋养”、“赋予生命”的意象。《新约》赋予“水”救赎象征的意义：“不管怎么说，从水中救赎的主题是从一系列故事中产生的，其中包括挪亚方舟，以色列人越过红海，还有洗礼的象征，受洗的人被分成两半，道德的一半象征性地浸没，不道德的一半逃离。”^①《新约》更是强调了“水”在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洗礼”象征着新生和复活，象征着上帝为人类提供的生命之泉和最后的救赎。

222

《喧哗与骚动》里有很多细节与“水”关联，“水”在小说里具有纯洁人的道德力量，带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凯蒂与男友约会后用水冲洗，才止住了本吉的号哭；1909年本吉14岁的那年夏天，凯蒂失去童贞后在洗澡间洗净自己。这些叙述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宗教象征意义，生动突出了“水”在故事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本吉虽然是一个毫无反理性的白痴，但他无意识地充当了凯蒂的道德提醒者和监护人的角色。每当凯蒂向堕落的边缘滑下一点点的时候，伴随着本吉的号哭，总使她产生一种内疚或负罪感。这时总会有对“水”的描写，“水”在这里具有涤净罪恶、洁净人类的功能。昆丁投水自尽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意象具有的象征意义，“影子意象与水的意象融合在一起的次数表明，投水自杀是昆丁用来调和他的两个世界、把影子与现实合并起来并缓

^① [加]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248页。

和其冲突的一种方式。不管水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纯洁暗示，但对昆丁而言，它主要是湮没感觉的象征……正是希望使这种平和得以永恒，昆丁才把身体交付给了水。在水里，才能解开环境的硬结，风的顶棚将永远竖立在他与喧闹的世界之间”^①。在昆丁的想像里，水给人一种平和永恒的感觉，象征着他在两个冲突世界里挣扎抗争的最终解决方法。

“树”在《圣经》记载中也是非常醒目的，伊甸园里生长着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亚当和夏娃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和“原罪”的产生。亚当和夏娃还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穿。《旧约》许多书里都有各种树的意象，如无花果树、葡萄树、柏树等等，利用树叶的稠密茂盛来象征上帝选民的繁荣兴盛，采用树叶干枯的意象来比喻上帝对悖逆和堕落的以色列人的惩罚。这种表现手法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艺术表达效果。“树”本身的意象是为人类提供生命的果实和人生的智慧，但它同时隐含有某种诱惑的潜在可能性。

223

在创作《喧哗与骚动》的起初，福克纳脑海里就是一个爬到梨树上弄脏裤子的女孩的意象，当时作家并不特别清楚它的强烈的象征意义，“开始只是一个心理画面，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画面具有象征意义。画面上是一个穿着内裤的小女孩爬到梨树上，屁股上尽是泥。在那里，她可以从窗子里看到奶奶的葬礼，讲给树下的兄弟们听”^②。本吉的部分始终把凯蒂与树的味道联

^① Olga Vickery: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p.42.

^② Jean Stei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 see *William Faulkner: 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 p.73.

系起来。跟《旧约》里夏娃吃禁果一样，凯蒂一开始便冲破了传统的约束，她不顾昆丁的反对，脱掉外衣，结果树枝把内裤弄上了泥。那天晚上，迪尔西怎么也洗不掉上面的污渍。这一情节具有典型的象征意味，是整部小说发展的基本线索，暗示着故事后半部凯蒂的必然堕落。梅尔文·巴克曼认为：“福克纳似乎在把凯蒂沾有污渍的内裤与撒旦和伊甸园里的禁树联系起来，似乎把她的污渍与原罪联系起来。具有矛盾意义的是，凯蒂对本吉而言是生命之树，而对昆丁来说，则证明她是致命的智慧树。”^① 本吉躲避凯蒂的香水的那种恐惧感一直到凯蒂把香水送给迪尔西之后才渐渐消失，这时她闻起来才又有“林木”的味道。树木代表着人性美好的内容，随着“林木”味道的淡没和消失，凯蒂所代表的美好道德内容在不断地遭到侵袭和破坏。伴随着本吉感觉到的胁迫和发出的哭号，小说逐步再现了凯蒂在堕落道路上一步步下滑的过程，暗示着南方社会不可避免的堕落与衰败。

在《旧约》里，“火”总是伴随着上帝的愤怒和惩戒出现，大多跟上帝的荣耀或烈怒有关。上帝惩罚人类时，喜欢用“火”来表现自己的威力。福克纳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情节，就是一把火烧掉那些代表邪恶、犯罪或衰败的东西。《押沙龙，押沙龙！》里大火烧掉了塞德潘为之奋斗一生的“百哩庄”，《八月之光》中克里斯默斯放火烧掉了乔安娜的房子，《我弥留之际》的一场大火差点把艾迪的棺木烧掉。短篇小说《上帝的天花板》里也有描写教堂被烧的情景。《喧哗与骚动》里，福克纳也刻意描写了“火”这一意象，凯蒂常带本吉到他喜欢的火炉旁，后者浑然不觉，不知道火会把手烤痛。在福克纳的意识里，“火”具有惩戒力，是消灭人间罪恶的最具破坏力的工具。作家借着这一意象来表达对

① Melvin Backman: *Faulkner: The Major Years: A Critical Study*, p.19.

南方社会衰败和堕落的痛恨之情。

福克纳正是借着这些意象和象征，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对美国南方传统的批判主题。透过这些富含深意的描述，读者可以一窥南方人心理深层的那种复杂的“南方情结”，而小说的艺术性也通过这些宗教意象和文学象征得到了更好的展示。

四

福克纳对《圣经》的运用方式曾一度遭到许多批评，因为对传统基督徒而言，他的作品的叙述方式和表现内容有时给人一种对宗教信仰的亵渎之感。其实，作家只不过是拿宗教作为他的文学叙事视角，一个文学隐喻，而旨在为他提供表现道德价值观的评判标准，所以他经常变换《圣经》的主题、结构或意象，或对《圣经》人物形象进行逆转倒置。有时候，作家非但没有对宗教传统表现出应有的虔诚和尊重，还经常一反其意，借着反讽手法对宗教内容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大宅》里出现了“救救我们吧，基督，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狗浑蛋”（《大宅》271页）。这类祈祷词，令人忍俊不禁。在《我弥留之际》一书里，本德伦一家背负着他们的“重担”（指棺木）经历了洪水、大火和炎热的侵袭，表面上看是为了满足本德伦太太临终的愿望，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小镇》里的弗莱姆·斯诺普斯爬到了杰菲逊镇银行行长的职位，拥有一座战前的大宅，而他的妻子尤拉·斯诺普斯却与银行家梅杰·德·斯贝恩通奸，是对他名副其实的不忠。尤拉的墓碑上却题写着“贤惠的妻子是丈夫的冠冕。她的孩子们起来称她有福”（A virtuous wife is a crown to her husband. Her children rise and call her blessed.）这样的墓铭志。铭文中把她说成是贤惠的妻子，明显带

有嘲弄和讥讽的语气。这两句铭文来自《旧约》：“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箴 12：4 和 31：28）。作家从《圣经》里抽取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稍作变动，短短的两行字取得了极为强烈的反讽艺术效果。

稍有《圣经》知识的读者都知道，“Rise”和“Blessed”均是基督教的核心术语，前者用来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复活，后者用来描写基督对人的祝福。如果从小说的内容来看，铭文里第二句话似乎也符合小说的情节，因为尤拉自杀的原因就是希望女儿琳达不知晓母亲与人通奸一事，而她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因为女儿最终还是尊敬母亲的，默许父亲因背叛而被同族的人杀死。

根据福克纳的观点，世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怜罪人，他们身上必然带有某种缺陷或弱点。正是人性的这些瑕疵才构成了文学创作反讽的生活基础。《喧哗与骚动》里，“康普生一家的自私自利、生活中没有爱、遭受挫折和失败，与基督临死时告诫门徒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形成强烈的对照”^①。康家衰败堕落的状况与基督教宣扬的博爱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比照，也是一种隐性的反讽形式。而在《八月之光》里，安斯·本德伦却因为接二连三地受到的可怕考验而向上帝感恩，因为这表明上帝在不断地关注他。这一描写突出了加尔文思想传统在他身上的表现，充满了辛辣的嘲讽意味。此外，福克纳三部曲里也有大量的反讽描写，艺术意趣十分浓郁。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反讽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对文学观念的嘲讽，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之目的；二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及口吻的描写来取得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讽刺。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I），32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五

综上，福克纳在创作中大量借用《圣经》故事和叙事框架，对《圣经》典故和人物进行创造性变动，采用宗教视角进行他的文学表述。由此，他的文学想像大多带有或浓郁或浅淡的宗教色彩和意趣。从福克纳创作的整体趋势来看，他对《圣经》传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圣经》母题的再现、对《圣经》结构的援引和变异、《圣经》意象和象征的借用、基督式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反讽手法的运用。

分析福克纳的宗教视角，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以基督教，尤其是南方清教传统作为创作的底蕴和媒介，作为文学作品里是非善恶等价值观的评判标准和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参照系。阅读和阐释福克纳，必须明确的是，作家对南方宗教传统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对他认为符合人性和人类道德内涵的内容加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而对那些束缚人性、摧残道德的清教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此意义上，基督教视角是作家进行文学想像的重要手段，而非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正如作家本人所言，他使用的一切文学手段，均是为了达到表述其创作思想这一目的。正因为作家生活在南方的腹地“《圣经》地带”，他思想意识里的清教传统很多时候是潜意识的存在。对福克纳而言，选择他生活于其中的南方一州一县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写作范围，利用宗教视角展开他的文学述说，大概是作家最为明智的决断。福克纳在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撇开他独特的写作手法和个性化风格不讲，恐怕他的写作内容和创作视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研究福克纳作为文学家的宗教视角，也就显示出了它本身的独特意义。

因此，无论是《八月之光》里的宗教偏见，还是《寓言》里基督式的复活，《押沙龙，押沙龙！》里罪孽的庄园主的“现世报”，《熊》里像耶稣的父亲那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都是作家对《圣经》文学传统的有意继承和运用。本文主要结合作家的南方宗教传统，讨论他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圣经》文学意识和传统，以此说明宗教因素在作家文学创作内在连续性方面所充当的重要角色。